

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游關係與詩學特色——以傳記資料為 核心的考察

洪敍銘¹

摘要

唐寅 (1470-1523) 是明成化、弘治年間吳中文壇的代表文人，他與祝允明 (1460-1526)、文徵明 (1470-1559)、徐禎卿 (1479-1511) 等人合稱吳中四子，因其師承與交游關係，構築了一個以獨特地域風格為特色的文人團體，其詩學主張亦有可觀之處。本文擬由傳記資料的整理，理解唐寅生平、交游網絡，進而連結其詩學主張，配合明代諸家詩品，掌握其詩學繼承及其風格的趨向，同時通過對吳中文人群體的總體觀察，一方面理解唐寅詩學理論上的侷限或矛盾，另一方面歸納他於文藝理論和創作的實踐，於當時文壇盛行的復古思潮中的特出形象。

關鍵詞：唐寅、明代文學、吳中四子、詩學、傳記

¹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洪敍銘，E-mail: 610108207@gms.ndhu.edu.tw

壹、前言

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禎卿合稱吳中四子，為明成化、弘治年間吳中文壇的主要文人群體。關於「吳中文人群體」的概念，范宜如指出：

當研究者以地域為標準來劃分文學集團時，作家生活的地域實際上被作為一種整合、牽繫、把握文學現象的線索。因而，當我們以「吳中」作為文人群體的名稱，所考慮的便是這群文人生活在共同的時空，有相似的人生經歷、相近的文化素養，進而有共同的文人活動。因為「地域」是使這群文人聯結起來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稱之為「吳中文人群（體）」。¹

吳中文人群體除了在生活環境、學養背景及其經歷與地域特性有著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關係外，文士間彼此交游關係與具體活動內容及其保留、傳世的往來記錄亦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史料。

《明史列傳·文徵明傳》寫到當時文學流派的「系譜」，也可以作為吳中文人群體的概念的呼應：

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並馳騁，文風極盛。徵明與蔡羽、黃省曾、袁軾、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與之遊者王寵、陸師道、陳道復、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²

在對吳中文人群體的歷史觀察中，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等館閣領袖在朝中掌握文柄，起了登高一呼的作用，一時共有地域關係的名士先後而出，藉由師承與交游關係構築一個以獨特地域風格為特色的文人團體。陸師道（1510-1573）〈袁永之文集序〉一文亦明顯勾勒出這樣的系譜：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響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啟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玄敬、文代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達，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³

1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頁35。

2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文苑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卷二百七十五，頁7363。

3 明·陸師道：〈袁永之文集序〉，收錄於清·黃宗義編：《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349冊，頁9a-b。

陸師道以回顧式的觀點，將吳中文人群體之傳統上溯自明初的「高楊四雋」；正統至成化、弘治年間，吳寬、王鏊成為承繼者，他們在朝中位居高官，對於文藝發展具有風行草偃之效；其後包括沈周（1427-1509）、李應禎（1431-1493）、楊循吉（1456-1544）、都穆（1459-1529）、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禎卿、蔡羽（?-1541）等吳中文士，亦被納入此一系譜當中，形成以地域為核心的文人集團發展之盛況。

觀察史料記載，不同年代之文士的相互串聯，其關鍵在於吳中地域的傳統承續，及其間的交游聯繫與文藝活動呼應；除了文士間交游、往來關係以及地域關係下的文學、文藝展現外，傳記資料如何重現了文人的生命歷程以及思想、性格等層面的轉變，此不僅扣緊了其交游景況及文學理論的延續或轉向，亦連結了代表一文學流派或集團的主要特色，或足以與其他流派、集團區分的獨特風格。本文將以唐寅為核心，透過傳記、年譜的考察、交游地圖的聯繫與詩學特色的表現三個面向，觀察唐寅於當時代的特殊形象。

貳、唐寅生命情境的考察：傳記與年譜

唐寅人生經歷的轉折與他的性格、交游皆有頗為密切的關聯。《明史列傳·唐寅列傳》對其一生有概括性的描述：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決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童，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⁴

《明史列傳》中敘述唐寅從早幼年「性穎利」的神童形象，到「縱酒」、「不事諸生業」，表現出唐寅狂放不羈的性格與生命態度；祝允明勸之以及中鄉試第一，文名始傳遍文壇，是他一生中最為風光的時刻，緊接而來的誣陷入獄，使他的人生急轉直下，在出獄後生活與心理情態偏向「益放浪」，延續了早幼年狂又放誕的狀態至其晚年，「與客日般飲其中」的描述，也把唐寅在仕途上的不遇和實際生活連結在一起。類似《明史列傳》的綜觀，《皇明詞林人物考》亦有描述：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為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為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為輕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⁵

4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文苑傳》，卷二百七十四，頁 7352-7353。

5 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四，收錄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

《皇明詞林人物考》和《明史列傳》都提到由中鄉試第一到坐事被廢的過程，以及唐寅於其後的改變，「益放浪名教外」除了是唐寅個性與性情上的轉向外，同時也反映在他的交游關係和文藝表現上。

從此二書對唐寅的概述中，大致上可以將其分為「鄉試中舉前」、「中舉至坐事株累後」、「寧王宸濠之聘等三個時期」，明代的傳記資料，分別有以下詳細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幾個時期之間，吳中四子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間所產生的交遊關係，而影響唐寅的詩學風格的構成，即值得與傳記資料相互參看。

一、鄉試中舉前

《皇明詞林人物考》和《明史列傳》都記載唐寅自幼即具才氣，且頗受到家族的期望，對於他早幼年的經歷，《姑蘇名賢小記》有以下記述：

性絕穎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屹屹有千里氣。父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猶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從己願，便可褫襦幘，燒科策。今徒籍名洋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先生於是瑾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第日取少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只求合時義。⁶

這段文字不僅表現唐寅自幼「屹屹有千里氣」的才情外，同時他生命情境的第一次轉折，在於其父親病歿後的頹廢、墮落，以致其至交祝允明苦勸他立志向學，並朝科考目標邁進，而「瑾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以及「繙討擬議，只求合時義」皆成為了他日後鄉試中舉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祝允明規勸唐寅「若從己願，便可褫襦幘，燒科策」，從另一個角度揭示唐寅對當時科考制度的排斥，由此可推知他通過科考而獲取功名或文名，是在不得不的環境下的一種妥協，而在早年的這般妥協，正好能夠反襯中晚年仕途不順遂進而在性情上的轉變。

二、中舉至坐事株累

大多數記載唐寅事蹟與經歷的傳記資料，都記錄了從鄉試中舉到坐事株累間對唐寅生命產生極大影響的事件，其中《吳郡二科志》的記述頗為詳盡：

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其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力薦之，得隸名。未幾，果中試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

書局，1991)第16冊，頁655。

6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卷下，《明代傳記叢刊》第148冊，頁74-77。

在世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召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為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錢。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⁷

唐寅的「試」途並不順遂，御史考並未及第，反而透過文徵明的父親文林的幫助與刺史曹鳳的推薦，才於不久後中鄉試第一。梁儲見了唐寅的文書和創作，因羨其文才而推薦給即將召開會試的主考官程敏政，而程敏政亦相當讚賞唐寅，此亦成為了後來忌者攻訐的主要原因。

《吳郡二科志》對於坐事的「前因」描述頗為詳盡，《明史竊列傳》則對「後果」有更清楚的說明：

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舉寅為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人徐經亟欲交知於寅，百金為壽，同舟俱北，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謁闐咽於門。儲還京，言於詹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寅以是與經咸得受知敏政門下，其春，敏政奉詔典禮闈，於是有訐二生於朝，以為敏政鬻題受賄者，詔逮二生，下詔獄連。⁸

《明史竊列傳》和《吳郡二科志》雖有不盡相同的記述，但其中言及了「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謁闐咽於門」，顯示至少於中舉後，唐寅的聲名已經傳遍，而在後一年春天，唐寅就被攻訐者誣陷下獄，使其失去能彰顯功名的機會，而以受罪之身遠離了京城。

這段經歷使唐寅的性情有了很大的轉變，亦是其一生中最為重要也影響他最深的事件，直接導致了他放浪名教外的表現，在文藝創作上亦有相當幅度的轉向。

三、寧王宸濠之聘

寧王宸濠一事據考證發生於正德九年（1514），係唐寅晚年時，其時寧王有反叛之心，於是於天下各地廣招文人名士入己幕下，吳中四子中唐寅、文徵明皆有收到邀請，而唐寅則實際前往，其記述可參《弇州山人四部稿》：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為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睹庶人有反狀，乃佯為清狂，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邪，放之歸。⁹

7 明·閻秀卿：《吳郡二科志》，《明代傳記叢刊》第148冊，頁782-784。

8 明·尹守衡：《明史竊列傳》，卷七十三，《明代傳記叢刊》第84冊，頁376-387。

9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收錄於日·長沢規矩也編：《和刻本漢籍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79 據明萬曆五年(1577)王氏世經堂刊本影印)第19輯，頁21a。

此段文字頗能夠代表唐寅晚年的情性和生活實景，除了書畫表現頗負盛名外，他觀察出寧王正進行反叛的舉動，因此佯裝發狂之態，「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的放狂行徑，雖可能是刻意的誇張展演，但也可以從中觀察出唐寅晚年與早、中年態度上的差異。

四、整體生命的描述

《國寶新編》對唐寅則不僅在其發生事件的記載，而更觀照了他的整體生命情境：

坐事廢，坦夷踈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群類。……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¹⁰

因坐事而廢後的「坦夷踈曠」，及在棄落之餘的「益任放誕」，都相當具體描述了唐寅的性情和其生活景況，對參唐寅最後一首詩作〈伯虎絕筆〉：「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¹¹他對一生的回顧，綜合《國寶新編》對其生命定為「狂」，可發現《國寶新編》的記述相當程度統合了唐寅的經歷、文學創作和其個性的互涉，表現出對其生命的總體觀察。

五、分期與年譜

江兆申將唐寅一生分為三期，其言：「對於唐寅，我認為『早期』應當定在他二十九歲以前，因為這一年他參加了鄉試，以後生活便陷入急劇變化中。『中期』應當在他二十九歲至四十六歲間。四十六歲由南昌歸來，生活又進入另一階的沈寂，因此從這時意直到他的死，這九年為他的『晚期』」。¹²江氏研究明言唐寅人生分為三期，其餘有概括以遭誣下獄為界分為前、後二期者¹³，亦有將獄後遠遊與桃花塢二期獨立而分為四期者¹⁴，另外也有細分至七期者¹⁵。筆者認為江氏「三期說」較能突顯唐寅人生歷程與態度的轉換，下就江書附錄之唐寅年表¹⁶為主，並參楊靜龢《唐寅年譜》¹⁷及周道振、張月尊編撰〈年表〉（頁 634-663），以分期的架構參看唐寅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及其生命情境。

10 明·顧璘：《國寶新編》，（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書集成》據明萬曆沈節甫輯陽羨陳于廷刊本影印），卷一，頁 11b。

11 明·唐寅：〈伯虎絕筆〉，收入於明·唐寅撰，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02），頁 159。本文以下引唐寅之詩文，出自《全集》者，將於後括號附註頁碼，不另行作註。

12 汪兆申：《關於唐寅的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叢刊甲種》，1987），頁 73-74。

13 如宋戈：《唐伯虎詩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陳伉、曹蕙民編注：《唐伯虎詩文書畫全集》（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

14 如謝建華：《唐寅》（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

15 如陳書良：《唐伯虎評傳》（新店：桂冠圖書，2002）、文源編著：《唐伯虎全傳》（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

16 見汪兆申：《關於唐寅的研究》，頁 129-144。

17 楊靜龢：《唐寅年譜》（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1970）。

(一)早期：成化六年至弘治十一年

年代／西元年	歲	年表	重要詩文資料
成化六年 1470	1	生。祝允明 11 歲、文徵明 1 歲。	
成化十五年 1479	10	徐禎卿生。	
成化十八年 1482	13	閉戶讀書，不交一友，後與祝允明訂交。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桀時之志錚然。余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而大契。 ¹⁸
成化十九年 1483	14	在里讀書，稍稍交友。	
成化二十一年 1485	16	獲交文徵明。時徵明父文林以過勸居鄉，甚愛先生之才，故先生得日請益於坐隅。 與文徵明同交祝允明、都穆，四人相與為友。	〈送文溫州序〉： 壁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不為少假；寅故戒栗強恕，日請益隅坐，興得遠不齒之流。(頁 227) 〈與文徵明書〉：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迨於今日。(頁 221) 〈又與徵仲書〉：寅與文先生交三十年，其始也，草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頁 224)
弘治七年 1494	25	父、母、妻亡。	
弘治九年 1496	27	日與鄰居狂生張靈縱酒，不是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	
弘治十年 1497	28	與徐禎卿相友善。	
弘治十一年 1498	29	先生因好古文辭，科考幾下第，知府曹鳳立薦，得隸名末。 中鄉試第一，刊印曰：「南京解元」。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	〈領解後謝主司〉：壯心未肯逐樵漁，秦運咸思備掃除，劍責百金方折閱，玉遭三黜忽沾諸，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三策舉場非古賦，上天何以得吹噓。(頁 59-60)

18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收錄於《懷星堂集》，卷十七，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 270 冊，頁 9a。

(二)中期：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十年

年代／西元年	歲	年表	重要詩文資料
弘治十二年 1499	30	與會試，二場後，給事中華咏核主試官程敏政預洩場題，華咏、徐經、唐寅俱下獄。	〈與文徵明書〉：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伎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續絲成網羅，狼眾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胆，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頁 220-221）
弘治十三年 1500	31	因好酒而家業益落，有妒婦，棄去之。	〈與文徵明書〉：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頁 221）
弘治十四年 1501	32	遠遊閩浙贛湘。 徐禎卿鄉舉中式。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放浪形跡，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癒，稍治舊緒。 ¹⁹
弘治十五年 1502	33	倦遊歸里，得疾，少癒，治理舊緒。	徐禎卿〈喜值唐子〉：以我夢寐心，逢君別離面，秋鴻昔共辭，春燕今同見。 ²⁰ 徐禎卿〈懷伯虎〉：問子初從遠道回，南中訪古久徘徊；閩中日月虛仙觀，越苑風煙幾廢台。賴有藜筇供放迹，每於鸚鵡惜高才；滄江梅柳春將變，憶爾飄零白髮哀。 ²¹
弘治十六年 1503	34	頻年頹放。	文徵明〈簡子畏〉：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氣屬豪華；高樓大叫秋鴈月，深幄微酣夜擁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劉叉；只應郡郭聲名在，門外時停長者車。（頁 625）

(續後頁)

19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頁 10a。

20 明·徐禎卿：〈喜值唐子〉，收入於明·徐禎卿撰，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 114-115。

21 同前註，頁 166。

(接前頁)

年代／西元年	歲	年表	重要詩文資料
弘治十七年 1504	35	鬻文賣畫，以度其歲月，飲酒挾妓，以遣其生涯，後世遂調為任誕不經。	
弘治十八年 1505	36	文徵明、徐禎卿等和沈石田落花詩。 徐禎卿進士。 與文徵明幾至絕交。	〈答文徵明書〉：故陳張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荊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己齊物，等眾辯於鷇音；出門同人，戒伐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怒。然牛逆羊順，願勿相異也。（頁 223）
正德二年 1507	38	築桃花庵別業及夢墨亭。	《堯山堂外紀》：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 ²²
正德六年 1511	42	徐禎卿卒。	
正德八年 1513	44	與文徵明修好。	〈又與徵仲書〉：寅師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鎔其渣滓之心耳，非矯矯以為異也。（頁 224）
正德九年 1514	45	寧王宸濠慕先生名，厚幣來聘。先生遊匡廬、渡彭蠡，至南昌。	
正德十年 1515	46	自南昌歸。 晚年寡出，與文徵明亦不甚相見。	《堯山堂外紀》：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唯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 ²³

(三)晚期：正德十年至嘉靖二年

年代／西元年	歲	年表	重要詩文資料
嘉靖二年 1523	54	有自書詩翰冊。病歿	祝允明〈再輓子畏〉：少日同懷天下奇，中年出世也曾期，朱絲竹絕桐薪韻，黃土生埋玉樹枝，生老病餘吾尚在，去來今際子先知。當時欲印樞機事，可解中宵入夢思？（頁 620）

參、唱和與贈答：唐寅與吳中三子的交游

唐寅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並稱「吳中四子」，《明史列傳·徐禎卿傳》：「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²⁴《文徵明傳》

22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九一，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明刻本影印）第 1195 冊，頁 126。

23 同前註。

24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文苑傳》，卷二百七十四，頁 7351。

亦有記云：「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切靡，名日益著。」²⁵揭示四人間在文藝上的密切交往。而所謂「才子」，《國朝獻徵錄》引王世貞〈文先生傳〉云：

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為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²⁶

可見四者在詩文書畫上各有涉獵且頗具才華，《詩藪》亦言：「吳中徐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沈啟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²⁷可推知當時吳中四子不論在創作風格或文士交往上，某種程度引領了吳中文壇或吳中文士群體。

在明代的傳記記載以及吳中文士的書信或贈答作品中，可以發現其間密切且頻繁的交游，其中最能代表且共同反映出吳中文士交游實景的，應推和答沈周〈落花詩〉一事。文徵明〈小楷落花詩〉記云：

弘志甲子之春，石田先生賦得落花之詩十篇，首以示壁，壁與友人徐昌穀甫相與嘆豔，屬而和之。先生喜，而從反和之。是歲，壁計隨南京，謁太常卿嘉禾呂公，相與嘆豔，又屬而和之。先生益喜，又從而反和之。自是和者日盛，其篇皆十，總其篇若干；而先生之篇，累三十而未已。²⁸

〈落花詩〉始自於沈周作〈落花詩〉十首寄予文徵明，而文徵明當時與徐禎卿分別作了十首唱和沈周之詩，沈周因而再和十首；而吳中文士間以〈落花詩〉相互唱和的舉動透過言傳或贈答而流傳盛行，唐寅亦有詩作傳世，可作為紀念與記錄這一場盛大的吳中文士集體唱和、贈答的創作活動。

當時吳中文士主要透過詩作的相互唱和以及贈答進行實際的交游，唐寅晚年築桃花庵，即成為一吳中文士的據點，其情景可見〈桃花庵與祝允明黃雲沈周同賦五首〉其二之一：

列伍分高下，栢盤集俊賢；五陵通俠逸，四姓號神仙。春月襟期好，秋風卞射聯。遙知文集處，伐木有詩篇。（頁 45-46）

從「俠逸」、「神仙」可以觀察出其任游、自適的情景和態度，是一種文士交游間自然的展現。無論是〈落花詩〉的唱和或是桃花庵的宴飲，都可以視作吳中文

25 同前註，卷二百七十五，頁 7362。

26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二，《明代傳記叢刊》第 110 冊，頁 97。

27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據明刻本影印）第 1696 冊，頁 250。

28 明·文徵明：〈小楷落花詩〉，《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二十五，頁 1384。

人群體具體生活或彼此人際網絡關係具體而微的縮影，唐寅及餘三子或多或少的參與了其中，形成了一張巨大的交游地圖；然而唐寅和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三人並稱吳中四子，自然與他們有更為至深的交往，分別能從他們之間的書牘往來以及其文其詩梳理出來。

一、與祝允明之交游

據年譜，祝允明長唐寅十一歲，二人相交約是成化十八年（1482），〈唐子畏墓誌并銘〉記載：

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桀時之志錚然。余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而大契。²⁹

祝允明言唐寅早幼年以及其在父親逝世後的情態，以及規勸其暫向科考制度妥協而達己之志的具體內容，唐寅看待他與祝允明之交，可見〈與祝希哲論交〉一文：

古今交道紛然，要其善全始終者，莫如一淡字。僕之與足下，累日一見，累月一敘，其何淡也！乃平生所以奉足下者，論學則詩，論齒則長，論心則一人而已；故相忘不計形骸，相信不渝金石。一朝投合，此肺肝也；十年晤見，此面目也；以是言交情，謂天下最淡者，孰如我兩人？謂天下最濃者，亦孰如我兩人？相與終古。無可間矣。³⁰

此段自述，表現出唐寅與祝允明間交往的緊密、情感上互為肺肝、學問上論學相長，其中「故相忘不計形骸，相信不渝金石」可見二人的形象相近，都偏向狂放而不羈而彼此投合。唐寅於此封書信中言及了他將祝允明視為一生的至交，甚至「相與終古。無可間矣」，展現了兩人深厚的交誼，祝允明〈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詩亦云：「唐生白虹寶，荊砥夙磨磷。江河鯤不徙，魯野遂戕麟。」（頁 620-621）亦顯見他對唐寅才情的欣賞以及其人生經歷的充分了解與嘆息，可作為二者間交往關係的參照。

二、與文徵明之交游

唐寅與文徵明同年，據年譜，二者於成化二十一年（1485）相交，因文徵明之父親文林自唐寅早年即相當欣賞他的才華，〈又與徵仲書〉便有記：「寅與文先生交三十年，其始也，草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頁 224）是作於正德八年（1513），其中即提到他與文氏一家的關係。

29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頁 9a。

30 明·唐寅：〈與祝希哲論交〉，見鐵琴廬主編：《唐伯虎書牘》（臺北：廣文書局，1989），頁 27。

和祝允明相比，文徵明年紀雖與唐寅較為相仿，但唐、文間似乎沒有如唐、祝二人如此契合，如唐寅所作的絕交信〈答文徵明書〉：

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喧，林鴉夜眠；胡鷹從翻於西風，越鳥附巢于南枝；性靈既異，趨從乃殊。……蓋古人忘己齊物，等眾辯於穀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頁 223）

唐寅與文徵明絕交的前因雖無定說，但就此信所言「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以及「性靈既異，趨從乃殊」，可以推測是文徵明對於唐寅偏向放誕的行為多有微詞，甚至直言勸諫，使唐寅心中不甚舒坦，進而產生嫌隙，甚至直言了「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怒」，進而「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明顯表現出他與文徵明性情上的殊異。

唐寅、文徵明二人的性情雖異，卻不影響文徵明對唐寅實際的幫助，與彼此緊密的關係，〈又與徵仲書〉云：

爾後太僕奄謝，徵仲與寅，同在場屋，遭鄉御史之謗，徵仲周旋其間，寅得領解。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炊者久矣，寅視徵仲之自處家也，今為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頁 224）

由此可知，唐寅在中年入獄前後困頓時，文徵明不論是「周旋其間」或「笑而斥之」，都顯示他對唐寅的支持與相助；又因年歲的相仿，二人視如手足，情感十分深厚；〈又與徵仲書〉又云：「昔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頁 224）也表現出唐寅對文徵明的佩服之情。

文徵明〈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詩云：「皋橋南畔唐居士，一榻秋風擁病眠，用世已消橫槩氣，謀身未辦買山錢。鏡中顧影鸞空舞，櫪下長鳴驥自憐。正是憶君無奈冷，蕭然寒雨落窗前。」（頁 624）亦是對唐寅的深刻了解及嘆惜，「鏡中顧影鸞空舞，櫪下長鳴驥自憐」兩句更顯現出唐寅的失落及其生活情境，可知唐寅、文徵明二者雖在性情上不如唐、祝間接近，但仍存在深刻情誼。

三、與徐禎卿之交游

徐禎卿與唐、祝、文三人有較大的年齡差距，徐生於成化十五年（1479），與祝相差 21 歲，與唐、文二人亦有 10 年之差；徐禎卿後來北學，並於正德六年（1511）逝世，使其與唐寅交游不似祝、文二人緊密。不過，唐寅和徐禎卿間亦時有書信往來，其中〈與徐昌穀〉二封最能代表二人間的交往：

風雪殘冬，寒梅又著花矣，僕自放逐以來，事業寄諸詩筒酒盞，蹤跡只在山顛水涯，自去自來，無有羈絆，亦覺閒適。日來掃梅芷中積雪，活火烹之，以淪佳茗，清芬冷雋，蕩滌塵心，頗有世外之味。又摘梅苞，用以浸酒，亦有佳趣。足下寄身京國，位居祭酒，貴顯往來，公卿酬應，京塵十丈中，亦有此樂否？得毋反羨狂生乎？³¹

此時徐禎卿已在京城，而唐寅正於閩浙一帶遠遊，唐寅寄此封信除了表達對他的想念外，同時也掛心在京城身負重任的徐禎卿，其中隱含了勉勵意味；唐寅第二封〈與徐昌穀〉更清楚的勾勒二者的交游：

還雲至，距寄發日，且五月之久，關山遙隔，可見即鴻雁亦不易飛越也。來詩脫略形跡，亦有歸隱之思，豈竟以僕前此一書所致耶？雖然僕言戲耳，豈足為法！足下抱負不凡，物望正隆，立功立德，端在斯時；豈可學僕之不肖，而以頹廢終其身哉？況足下中年，正可有為，將來俟功成名就之後，歸隱衡門，左右猿鶴，亦未為晚。何必亟亟於此時哉？僅抒管見，還希見納。³²

此信提到徐禎卿似有歸隱之意，唐寅力勸他繼續堅持並展現自己立功立德的抱負，而非學習正遠遊、頹廢的自己，信內充滿對徐禎卿的期待和鼓勵。由此可知唐寅對徐禎卿的態度偏向與後輩的相處，言語中多帶有正面與支持。徐禎卿詩記與唐寅之軼事，亦可充分地展現二人的情感：

白壁無媒翻見侮。昨日結交燕少年，酣歌擊筑市中眠。正逢天子失顏色，奪俸經時無酒錢。入門百結鷓鴣盡，笑立文君明鏡前。卻思舊日高陽侶，黃公酒壚何處邊？天下綈袍誰不憐？卻卿未具山中屨，何人為買剡溪田？唐伯虎，真俠客！十年與爾青雲交，傾心置腹無所惜。擊我劍，拂君纓，請歌鸚鵡篇，為奏朱絲繩。胡為擾擾蒼蠅之惡聲？我今蹭蹬尚如此，嗟爾悠悠世上名。³³

唐寅為籌築桃花庵而與徐禎卿商借金錢，時徐禎卿剛到京城而無多寬裕，因此事唐寅略有不悅，徐禎卿特別作詩向唐寅解釋、賠罪，其中「十年與爾青雲交，傾心置腹無所惜」語，扣準了唐、徐二人間的傾心置腹而無所保留的交游關係。

四、唐寅性格之特徵

考述唐寅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的交游關係，可以歸納以下幾點具有意義的觀察：

(一)唐寅認為祝允明能與其「相與終古」的原因係二人形象、性情相近，皆多放浪於名教外，可見他習於的生活方式，至於與文徵明的絕交，多年而後求合的行

31 明·唐寅：〈與徐昌穀〉，《唐伯虎書牘》，頁 58。

32 同前註，頁 58-59。

33 明·徐禎卿：〈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貲，貽書見讓，寄此解嘲〉，《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頁 416-417。

文內容，也多是直抒胸臆、不吐不快的方式；與徐禎卿借錢購築桃花庵事，亦是直接表達心中不滿，致使徐禎卿作長詩相贈，皆可以充分的感受。

(二)唐寅已有意識自己的「狂」近祝允明而遠文徵明，更與徐禎卿的立志北學有很大的差距，這些性情的特色都影響或融涉入他的文藝創作以及他的文學風格、特色，也可以藉他與吳中三子的交游關係，來觀照他們之間文學理論的同質與殊異，並成為理解該文學流派與群體的線索之一。

肆、唐寅的詩學特色

唐寅的文藝理論受到兩個層面的影響，其一是自身經歷與性情的轉折，其二則是吳中文人群體的地域傳統，這樣的影響可由唐寅，甚至擴及吳中四子詩學繼承的傾向，以及瀰漫整個明代的古文詞問題討論觀察得來，以下即由此二層面解析唐寅的詩學特色。

一、詩學繼承的傾向

關於唐寅詩學繼承的問題，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有記云：

子畏為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鍛煉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仿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³⁴

祝允明對唐寅的詩文有幾個重要的理解，首先「無常態」，顯示其並不刻意集中仿效某一體，具自由的寫作態度；其次，他認為唐寅詩學白居易，但並非效法體製，而是「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一方面傾向表達人們的真實情感，另一方面注重語言文字的藝術效果。〈唐寅詩話序〉亦有相近的敘述：「詩文，作詩初喜穠麗，後學白居易，務達情性而已。」³⁵確實可以據此考索唐寅的詩學傾向。

《吳郡二科志》記云：「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³⁶指出唐寅為文以駢儷稱絕，詩歌以婉麗為工，且學劉禹錫，強調了唐寅對語言和文字美感的經營；而《山樵暇語》云：「唐解元寅詩，多類白樂天，善於模寫，深得人情物態，悲懽窮達。」³⁷則強調唐寅詩作與白居易詩具有「平易疏暢」的共同風格傾向，並且透過詩具體而微地表達真實、平實的人物情感與樣態。

藉由這些記載，可以大致確認唐寅詩的繼承，主要以白居易、劉禹錫等中唐詩人為主，由此觀察餘三子的詩承，亦可以發現同質性，如《藝苑卮言》記文徵

34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頁 11a-b。

35 吳文志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 2 冊，頁 1950。

36 明·閻秀卿：《吳郡二科志》，頁 782-783。

37 明·俞弁：《山樵暇語》，卷一，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濟南：齊魯書社，1995 據明朱象玄鈔本影印）第 152 冊，頁 12。

明：「文徵仲如仕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先生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間。」³⁸便從「傳情而發」的角度將其詩與柳宗元、白居易、蘇軾連結，同樣表現詩具有表達情感的積極作用；又如〈焦桐集序〉述徐禎卿：「於唐諸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高哦雋諷，倦焉如懷。」³⁹也連結了徐與白居易與劉禹錫詩間的關聯。

雖然史料之記載，強調吳中四子的詩學上承中唐，但筆者認為他們並非特定效法某個對象或某一「體」，反而從中開展一種「詩不僅宗唐」的理論脈絡，如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云：

唐人以詩為學、為仕，風聲大同，情性略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遠絕，猶十五國各為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國朝詩人其始如劉崧、林鴻輩，以至四傑、十子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興！沈公獨醜涓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常試觀之，唐與！宋與！眾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為浣花耳。是以興觀群怨，君父動植，已發之而自愜，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朝詩人，為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乎。⁴⁰

也就是說，以白居易、劉禹錫為對象雖是一個明顯的傾向，但真正的關鍵應在於「詩傳情而發」，即他所學習或效法、欣賞的是情感平實表達的創作風格，同時也形成了一種特色。林賢德《明代中葉吳中名士詩歌研究》即有下述：

吳中名士大抵學習白居易、蘇東坡、陸放翁，與當時「詩必盛唐」之擬古運動本自異趣，而其能擺脫模擬，另闢蹊徑，尤為可貴。⁴¹

吳中四子的詩學繼承，與當時盛行「詩必盛唐」的復古傾向有相當的不同，吳中文士的認知基本上是沒有典範作品的，重要的是表達情感的方式是否真實，因而表現了他們的特色。

此外，唐寅文被認為駢散兼參並具有六朝之氣，如《藝苑卮言》言：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脫逗者，其傳合史實，纖毫必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⁴²

38 明·王世貞撰，羅仲鼎校柱：《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卷五，頁259。

39 明·文徵明：〈焦桐集序〉，《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頁848。

40 明·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懷星堂集》，卷二十四，頁24b。

41 林賢德：《明代中葉吳中名士詩歌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頁152。

42 明·王世貞撰，羅仲鼎校柱：《藝苑卮言校注》，卷六，頁314-315。

六朝文風的學習以及他對於語言文字美感藝術的經營，確實成為他重要的詩學風格及特色；在詩歌部份，唐寅首重展現真實的感情，重視生命情境的遣「辭」命「事」，〈唐伯虎集序〉云：

伯虎者風流跌宕人也，蓋有才而不善用之者也。彼自負有才而善用之者，強半皆工於鞏悅者也。工於鞏悅者不取也，則不如伯虎之不事鞏悅而足以成其為伯虎者也。……所著詩文，翩翩有奇藻：乃其邁往不屑之韻，卓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是烏可以無傳哉？（頁525-526）

此言將唐寅的生命經歷與他的創作風格、特色結合在一起，唐寅之文才並不展現於「鞏悅」，即華麗雕琢的辭采，所重的是傳達生命情境的真情實感，這樣的特點成就了唐寅在明代詩學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時突顯了他和吳中三子的不同之處。

二、古文詞問題——反時文、博學、重趣的徑路

古文詞的討論在明代文壇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話題，所謂的古文詞，指的是「古文」與「詩」，用以與「時文」區隔⁴³。據年譜，唐寅於成化二十一年曾與文徵明、祝允明、都穆三人討論古文詞的問題，顯見其早年已有對此的關注，如以下三條資料：

吾友錢君孔周……雅興闊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居簡齋齋，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晤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讌笑，評騭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⁴⁴

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元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銳，間然皆以古人自期。⁴⁵

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原稿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⁴⁶

由這三條資料可知，唐寅早年與吳中文士創作古文詞，或者以其「評騭古今」，並以其聞名，「以古人自期」的敘述可以反映他們的創作意圖與態度，皆有「不屑事場屋」的傾向，即對科舉制度以及「程文」的不滿。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云：

43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139-140。

44 明·文徵明：〈錢孔周墓誌銘〉，《文徵明集》，卷三十三，頁756。

45 明·文徵明：〈題希哲手稿〉，《文徵明集》，卷二十三，頁563。

46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頁9a。

然當時言古文辭者，每與「精能」、「博學」並舉，而不輕易以擅長「古文辭」稱美他人。⁴⁷

「擅古文詞」是一稱美之詞，主因是當時盛行復古傾向的詩學傳統；唐寅等吳中四子有意識的創作古文詞，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反時文、反程文的方向，博學的基底至「趣」的發揚與延續，則成為以唐寅為主，推展古文詞的主要徑路，同時也顯現了唐寅詩學重要的特色。

(一)反程文

范宜如認為：

程文和古文辭矛盾之根源在於科舉制度。……所謂程文，即是為科舉而寫就之文；而古文辭，則以古學為主，一則是「古文」，一則是「時文」。……程文之文的學習方式是「文法」與「章句」，注重的是體式的統一，學習古文辭則需要閱讀的積累，須諷讀經史文集，以深厚的學養作為根柢。⁴⁸

從唐寅傳記資料與年譜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唐寅早年即對「程文」相當反感，時至祝允明規勸而暫時妥協，才有後來回歸科考系統進而鄉試中舉之事。但本質上，程文在體式、內容等層面上都有嚴格的規範，並有統一的格式必須亦步亦趨，除了與唐寅的個性與性格有很大的差距外，也和他欲突顯詩文中感情的揚發的主張有很大的扞格。也因此，在唐寅進行古文詞的討論時，即已有反對程文的主要方向。

(二)博學為古文詞之基

簡錦松認為：「古文辭之真精神，在於博學於古而能詩文。」⁴⁹反映博學是為古文詞最重要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上，還要能為詩為文，傳達並展現其「真精神」。《新倩籍》記唐寅云：「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通，不為章句。」⁵⁰從徐禎卿的角度來看唐寅的學問是「喜古書」而「博通」，且「不為章句」的，除了呼應他反對程文以及對科舉考試的抗拒外，博通古書成為他的深厚基底，顯示唐寅博學的工夫。〈唐子畏墓誌并銘〉亦有云：

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⁵¹

祝允明對唐寅的博學工夫有深刻的理解，除了古書外，他發現唐寅對於玄學、天文曆法、史書、音律，而至宗教等皆有鑽研，並且多有會通，這不僅突顯了唐寅

47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頁 139-140。

48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頁 44-49。

49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頁 139-140。

50 明·徐禎卿：《新倩籍》，《明代傳記叢刊》第 21 冊，頁 481。

51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并銘〉，頁 10a-b。

的博覽群經的基底外，同時從他所研讀的書籍取向，也可以窺探他的文藝風格，與六朝之風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疊合。

(三)「趣」的表現

唐寅詩歌的「重趣」，在當時詩壇主流中甚為特殊，《徐氏筆精》云：「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詩雖不甚雅馴，而一段天然之趣，字不可及。」⁵²此言提到唐寅的詩「不甚雅馴」，顯示出他不向經典看齊的創作態度，而「天然之趣」則在於他對於情感、情景自然流洩的傾向，如〈散步〉一詩：

吳王城裡柳成畦，齊女門前水拍堤；賣酒當壚人袅娜，落花流水路東西，平頭衣襪和鞋試，弄舌鉤輶繞樹啼；此是吾生行樂處。若為詩句不留題。（頁 87）

此詩展現唐寅所謂的「吾生行樂處」，除了花鳥怡人的景色外，更是有酒、有人的平實生活，再參〈失題〉：

樂在村中住，為識村中樂。矮屋竹篠蓋，低牆藤蘿路。明窗鋪筆硯，爛飯飽藜藿。鄰里別雞豚，昏鳥喧烏雀。竈煙裊屋顏，瓶湯鳴牀腳；老酒煮黃精，小菜簇烏藥。士空客積粟，墻居寄杯橐；秋葉紅駿驕，春花香作惡。無火借石敲，有井當庭鑿；有鹽釐富貴，無燈書寂寞。夫妻八尺牀，風雨一雙屨。于人無忤求，于世無乞索。天下方太平，鄉里免漂泊。君能知此趣，吾詩所以作。（頁 18）

開頭則言村中之「樂」在於實際生活其中，而他所謂的「趣」，則見於日常生活中矮屋低牆、老酒小菜的簡單人情，與無所忤求、乞索的太平生活，因此才說「君能知此趣，吾詩所以作」。唐寅這種「天然之趣」，亦可呼應他任真自得的性情以及他越趨晚年的人生經歷。

除此之外，唐寅〈嘯旨後序〉較未有研究者注意，但其中亦頗有重趣的思考：

今嘯者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哉？聲雖未諧，其間或稱取聲自上齟齬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齟齬出為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為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為聲，必出於平而不出於仄矣。……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頁 226-227）

袁宏道曾於此文後評：「戒字學之餽羊」（頁 227），說明此篇意旨在於唐寅認為文藝的創作應該擺脫音律等強制規範的框架限制。由「嘯」字出發，唐寅探索了該字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唐寅首先認為「今嘯者亦有聲而無字」，原因是「嘯」

52 明·徐渤：《徐氏筆精》，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 169 冊，頁 33a-b。

是由情而發出的聲響，並不若聲韻規範下的某一個字音，因此他推想「嘯之為聲，必出於平而不出於仄矣」，卻是與實際語音的狀態不符的，唐寅對此的解釋則是「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即表示了他覺得小至一個聲響，大至詩歌創作，應看重人的情感與外在景象相互結合，始得人生之大快，此即能與他的「天然之趣」互相對應，並從中觀察出唐寅對於「趣」的看法。

(四)「通」與「俗」

「通俗」是唐寅為人所知的詩歌特點，當時各家詩評多有提及，如《藝苑卮言》云：「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⁵³另如《明詩評》言：「寅實異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法初唐……暮年脫略傲睨，務諧俚俗。」⁵⁴俱指出唐寅晚年詩歌朝向俚俗之風格特點。《皇明詞林人物考》亦云：「先生之始為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⁵⁵「放格」、「諧俚俗」都是表現晚年詩歌更為放誕自然的傾向，而其後的創作目的是「風人之指」以及「令人解頤」，都可以充分聯繫到他的詩學繼承傾向與風格。

《夷白齋詩話》云：「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⁵⁶明確指出唐寅晚年作詩有意識的使用俚語，如所引之詩，化用了當時的俗語，字字白話通俗，頗能代表他的詩歌特色；針對這樣的創作風格，《明人詩品》云：「而詩則放筆直書，多不經意，此作達幾於遊戲。」⁵⁷《靜志居詩話》云：「而詩則縱筆疾書，都不經意，以此任達，幾於遊戲。」⁵⁸也共同揭示了這樣的特點。

在許多詩話評述中，唐寅詩歌文字內容認為近於遊戲，但筆者認為他仍顧及了語言藝術的美感經營，《弇州山人續稿》有記云：「余嘗有唐伯虎《桃花庵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⁵⁹即指出在「流暢可喜」之外，詩的語言仍意義雋永，令人神馳迷醉，足可證明唐寅詩歌的通俗性，並非朝向「俚俗」化。此外王世貞〈題唐伯虎詩畫卷〉亦言：

唐伯虎桃花庵歌當有圖，不知落何人手。予後得一幀，意頗與歌似，而秀潤婉麗，妙入趙吳興三昧；因裝潢成卷。按二科志載博虎首篇作悵悵行，又有「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春不可憐」二語，今皆削去。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事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

53 明·王世貞撰，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卷五，頁259。

54 明·王世貞：《明詩評》，《明代傳記叢刊》第8冊，頁54。

55 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四，頁655。

56 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百部叢書集成》據清）曹溶輯，陶越增訂《學海類編》影印），頁8a-b。

57 清·杜蔭棠輯錄：《明人詩品》，卷一，《明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41。

58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九，《明代傳記叢刊》第9冊，頁247。

59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九，收錄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永和：文海出版社，1970）第22集，第16冊，頁7746-7747。

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胡釘鉸矣。余十年弄筆墨，不敢置眼睫間。今老矣，愛此畫不妨併讀此詩，一再過也。⁶⁰

王世貞提到唐寅的〈悵悵詞〉：「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處逢春不悵悵，何處逢春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我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頁 31）此詩配合「如父老談農，事事實際」對讀，除了是談當前情景外，同時也是詩人自身情感的流露，沒有阻礙閱讀的拗口文詞；而「中間作宛至情語」則強調了他對文字美感的追求，如「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句，皆將情景交融於一畫面中，故讓人嘆服。

前述唐寅由古文詞問題逐步構築自己的詩歌風格和特色，包括重「天然之趣」及「通俗」的傾向，如果要嘗試將唐寅的詩學主張統攝起來，必須參考〈作詩三法序〉：

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為法，又各有三。章之為法，一曰氣韻宏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高古。詞以寫意，意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詞古，而章句備矣。為句之法，在模寫，在鍛煉，在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因游如縫衣，必稱其體，是為句法。而用字之法，寔行乎其中，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仙。字以成句，句以成章，為詩之法盡矣。吾故曰：詩之為法有三，曰章、句、字。而章、句、字之法，又各有三也。間讀詩列章法，於其題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標之，蓋畫虎之用心，而破碎滅裂之罪，不可免矣。觀者幸恕其無知，而諒其愚蒙也。（頁 229-230）

此文提到「章」、「句」、「字」為詩之三法。首先，「章」可視為結構，必須達到「氣韻宏壯」、「意思精到」、「詞旨高古」，但他反對模擬，認為文詞的作用在於「寫意」，完整且真實的展現文意，配合創作思想的壯大及書寫時的精細構思，才能達成「章」的要求。從「宏壯」至「高古」，可以看到唐寅對古文詞傳統的一貫堅持，亦影響了他對詩歌創作的要求和態度。

其次，「句」可視為內容或情節，「游如縫衣，必稱其體」表示在確定詩的氣度高遠以及詞意真實近古之後，仍必須有好的寫作技巧才能適切表顯，因此「模寫」、「鍛鍊」、「剪裁」成為重要的三個徑路，此言牽連了「博學」的基礎，即必須廣泛的涉獵、研讀，以及重複的練習才能夠熟習且運用自如。

第三，「字」即是文字的挑選和使用，唐寅認為「妝點」、「潤色」、「變化」是相當重要的，此呼應了他對語言文字美感的要求，也是他被認為部份詩文承續了六朝文風之因，他初期的詩被認為婉麗，甚至如王世貞言之「玉樓金埒」，都因在他的文藝理論中，文字之修飾是必要且必須的；而晚年詩歌風格則受到生

60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頁 9a-10b。

命經驗的轉折而產生變化。由此觀之，唐寅無論早、中、晚年的詩歌創作都存在各種風格，除了與人生經歷切實相關外，同時也是他的詩歌理論所主張的重要內容。

當然，唐寅雖標舉了「作詩三法」及其細則，但他仍不忘提示「間讀詩列章法，於其題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標之，蓋畫虎之用心，而破碎滅裂之罪，不可免矣」，說明這些法則必須內化至詩人的內心，最終仍然必須透過情感而生發，若只是一味的照本宣科、模擬仿作，自是不得要領。這樣的論點，統合了唐寅詩歌理論的全貌，林賢德即言唐寅的詩歌特色：「詩歌具備鮮明的個性，富有詩人自身的情感。因其境遇而情感生焉，情生於中，故發為歌詩，乃具鮮明之個性與浪漫之風格。」⁶¹以真情情感為基，感發外在環境以及內在經歷與記憶的詩歌創作，富涵了詩人最為真實的部份，也具有獨特且鮮明的特徵。唐寅之看法，恰與祝允明相近，如〈送蔡子華還關中序〉：

身與事接而境生，境與身接而情生。……是故以情之鍾耳，一其自得之處，其能以人之牙頰而盡哉？⁶²

可以發現唐寅的創作態度偏向對於自身經歷的探索，配合當下環境而生情之掌握，最後再以文詞構築出詩文；另外，唐寅一生的轉折與其文藝創作的轉變實質影響了他的詩歌理論和特色，進一步連結了吳中文人群體在復古文藝思潮中的特殊形象。

伍、結語

吳中四子活躍於明成化、弘治間，他們因地域因素聯繫，在詩學理論上有頗為一致的趨向。從本文的研究與推論中可以發現，文學性的表達和生命感的發掘皆是唐寅文藝理論的重要核心，他在語言文字層面力求美感的經營，同時認為詩文創作應表達真情實感，融入詩人自身的經歷與外在環境的感發，展現了與時興文藝發展頗為不同的徑路。

而在對唐寅傳記資料的整理、理解唐寅生平及其與吳中三子的交游網絡，進而連結其詩學主張，配合明代諸家詩品，掌握其詩學繼承及其風格的趨向等回顧考察裡，亦可從發現他在詩學理論上，又能夠表現出他在當時文壇盛行的復古思潮當中，不僅與吳中文化潮流與其創作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也展現了頗為特出的形象。

61 見林賢德：《明代中葉吳中士人詩歌研究》，頁 147。

62 明·祝允明：《祝枝山全集》（臺北：漢聲出版社，1972），頁 51-52。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明·尹守衡：《明史竊列傳》，《明代傳記叢刊》第 84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明代傳記叢刊》第 148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日·長沢規矩也編：《和刻本漢籍文集》第 19 輯，東京：汲古書院，1979 年。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第 22 集，第 16 冊，永和：文海出版社，1970 年。
- 明·王世貞撰，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
- 明·王世貞：《明詩評》，《明代傳記叢刊》第 8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明代傳記叢刊》第 16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俞弁：《山樵暇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5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
- 明·胡應麟：《詩藪》，《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明·唐寅撰，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02 年。
- 明·徐燊：《徐氏筆精》，《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 1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 明·徐禎卿：《新倩籍》，《明代傳記叢刊》第 21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徐禎卿撰，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 明·祝允明：《祝枝山全集》，臺北：漢聲出版社，1972 年。
-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四庫全書珍本六集》第 2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第 110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續修四庫全書》第 1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明·閻秀卿：《吳郡二科志》，《明代傳記叢刊》第148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百部叢書集成》，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6。

明·顧璘：《國寶新編》，《百部叢書集成》，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6。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明代傳記叢刊》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清·杜蔭棠輯錄：《明人詩品》，《明代傳記叢刊》第16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四庫全書珍本七集》第3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文源編著：《唐伯虎全傳》，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年。

吳文志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宋戈：《唐伯虎詩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

汪兆申：《關於唐寅的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叢刊甲種》，1987年。

陳伉、曹蕙民編注：《唐伯虎詩文書畫全集》，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年。

陳書良：《唐伯虎評傳》，新店：桂冠圖書，2002年。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楊靜齋：《唐寅年譜》，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1970年。

謝建華：《唐寅》，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年。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鐵琴屢主編：《唐伯虎書牘》，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

林賢德：《明代中葉吳中名士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7年。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1月。

投稿日期：2016/12/23 接受日期：2017/02/22

Tang Yin's Social-Relation and Poetry Analysis-Investigating Biography

Hsu-Ming Hung¹

Abstract

Tang Yin is the representative literati of Cheng-Hua, Hung-Zhi generation of Ming Dynasty. Zhu Yun-Ming, Wen Zhen-Ming, Xu Zhen-Qing and Tang Yin himself are the Big Four of Wu-Zhong Literati. A literati group is established by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entor, which fosters a unique-region writing style and the poetry perspective is valued.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ang Yin based on biography-info collection. Together with other poetry works of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to focus on the trend of his poetry inheritance and style. In the meantime, by an overall observation on Wu-Zhong literati group, this article not only highlights Tang Yin's limit or contradiction on poetry but also expects to comb out his achievements of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ory and creation, which seemed to portray an outstanding impression from general revivalism at that time.

**Keywords: Tang Yin, Ming-Dynasty Literature, WuZhong Literati, Poetry,
Biography**

¹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Hsu-Ming Hung, E-mail: 610108207@gms.ndhu.edu.tw